

历史语境下美国“新女性”文学中 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

胡小花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新女性”文学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文坛流行的一种女性叙事,是当时美国社会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在文学领域的延伸,这类作品宣扬独立自强的“新女性”理念,描写“新女性”对维多利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反叛。本文以朱厄特的《汤姆的丈夫》、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和肖班的《觉醒》为例,从历史视角分析这三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认为这些试图重新定义自我身份的“新女性”以妥协、疯癫、死亡而告终的原因在于她们对传统的僭越、对旧秩序的威胁。

关键词:新女性;历史语境;朱厄特;吉尔曼;肖班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4-0070-05

The Tragic Endings of the Heroines of American “New Woman”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HU Xiao-hua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New Woman” literature is a type of female narrative that emerged in Americ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an extension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Woman Ques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to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New Woman” stories advocate strong independent women images and depict women’s rebellion against Victorian value system and code of conduct. This paper places Jewett’s *Tom’s Husband*,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Chopin’s *The Awakening*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nalyzes the heroines’ predicament. It concludes that these women who tried to redefine their identity ended up with compromise, madness or death because they trespassed against tradition and were a threat to the old order.

Key words: *New Woman*; *historical context*; *Jewett*; *Gilman*; *Chopin*

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由于女

权主义运动的冲击,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受到
质疑、男权社会体系开始动摇、女性的自我意识
逐步增强,她们挑战传统社会所强加给她们的性
别角色,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与男性平

收稿日期:2012-03-02

基金项目:美国“新女性”文学研究(06JK064)

作者简介:胡小花(1962-)女,陕西乾县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等,争取工作的权利以及个性的解放,这些妇女被称为“新女性”(New Woman),她们的生存状态广受关注,他们的反抗与斗争备受争议,现实生活中、报章杂志上狂热支持者有,强烈反对者有。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也在文学作品中探讨“妇女问题”(the Woman Question)并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从崛起到淡出,“新女性”文学大约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它宣扬女性独立自由的理念,记录妇女解放的历史,但与其说它是女权主义的号角,不如说它是被长期压抑的女性如泣如诉的心声与无可奈何的挣扎,“新女性”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的短篇小说《汤姆的丈夫》(1882),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1892)和肖班(Kate Chopin)的小说《觉醒》(1899)。本文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例,探讨“新女性”的追求与生存困境,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她们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

二、“新女性”文学诞生的历史语境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处于从属的、被动的、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认为女性的职业就是婚姻,家庭是女性的整个世界,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全部责任,人们期待女性成为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没有自我的“家庭天使”,在他们看来,“真女性”(True Woman)应该具有 Degler, Lystra, Smith—Rosenberg 等学者所总结的特征:虔诚(Piety)、纯洁(Purity)、顺从(Submissiveness)、利他(Altruism)、居家(Domesticity)^[1-3]。

许多女性认同男权社会为他们规定的性别角色,无怨无悔地抑制自己的个性、隐藏自己的才华、牺牲自己的理想,恪守“真女性”本分。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社会对她们的不公,希望接受教育、参加工作、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于是,所谓的“妇女问题”便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家庭生活中一个

重要话题,关于妇女地位、妇女权利、妇女职业的讨论充斥报纸、杂志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1845年 Margaret Fuller 发表了《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她认为女性不应该被限制在所谓的“女性领地”,而应该享有与男性同等的身心发展空间,她解释说,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并不是想统治,而是自然成长的天性,明辨是非的智慧,无拘无束的灵魂^[4]。1848年全美第一次妇女大会在纽约赛尼卡福尔斯召开,会议发布了《赛尼卡福尔斯感伤宣言与决议》,《宣言》列举了法律与传统对女性的不公、限制与压迫,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人对女人不断伤害与掠夺的历史,其直接目的是在妇女之上建立绝对专制暴政”,《决议》认为,“一切阻挠妇女谋取良知而需要的社会地位的法律,一切主张男尊女卑的法律,都是与自然的伟大法则相违背的,因而也是不具备任何法力或权威的”^[5],号召女性为争取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职业、宗教、道德等方面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而奋斗。

自此,“新女性”做为一个概念、一个形象、一个理想出现在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学中,其基本特征包括:1)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智慧;2)有自己的工作收入因此经济独立;3)参与政治、社会问题的讨论与决策;4)决定自己的婚姻与生育;5)着装舒适有个性;6)反抗传统的习俗与社会规范。

三、女性叙事中的“新女性”形象

美国社会关于“新女性”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文学领域。据 Ruth Bordin 考证,“新女性”一词为作家亨利·詹姆斯所造,用来描绘他笔下侨居欧洲的富有、敏感而独立的女性,如黛西·米勒^[6],其他著名男性作家如豪威尔斯也描写过这一类的女性角色。然而,真正塑造出“新女性”群像的还是朱厄特(1849—1909)、肖班(1851—1904)、吉尔曼(1860—1935)等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的女作家,她们的女主人公独立、勇敢、个性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汤姆的丈夫》中的玛丽,《黄色墙纸》中

的叙事者,《觉醒》中的埃德娜。这些女性人物,有远大抱负,她们走出厨房与育婴室,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希望在被男性占据的职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她们争取创造的机会与权力,希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智慧与才能;她们努力挣脱旧婚姻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樊笼,希望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精神自由和肉体解放。

朱厄特的短篇小说《汤姆的丈夫》,如标题所示,是一个关于男女性别角色颠倒的故事,男主人公汤姆和善、礼貌但胸无大志,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管理父亲留给他的工厂,而他的妻子玛丽独立、果断、具有杰出的企业管理才能且不满足于传统性别角色分配,于是,她在丈夫许可后走出所谓的“女性领地”,开始经营丈夫原本想卖掉的企业,先使其起死回生随之又扭亏为盈,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然而玛丽的成功让汤姆感到尊严扫地,她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以顾全丈夫的面子^{[7]205-212}。

吉尔曼《黄色墙纸》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有文学天赋、有创作欲望的女性,她做医生的丈夫认为“休息疗法”有助于她抑郁症的康复,便临时租了一所古老、沉寂、几乎与世隔绝的老房子,要求她绝对静养,禁止她写作,而写作需要思考、需要创造,她认为这正好能够给她单调无趣的生活增加色彩,给她带来快乐,为她提供宣泄情绪的渠道,因而有利于身体的康复,于是她便偷偷摸摸地开始写作。在不能写作的时候,她开始研究墙纸上的图案,久而久之,她发现在暮光、月光、灯光、烛光下那毫无品味、令人生厌的线条变成了铁窗上的栏杆,她感到图案(pattern,又指范式、模式)后有一个女人在爬行,企图撼动并穿越铁窗,日复一日,她终于忍无可忍,在夜深人静时撕开所有的墙纸以释放被囚禁在图案(或模式)后的女人。如此,这个不过是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人完全疯癫了^[8]。

1899年,肖班的《觉醒》面世,她挑战传统道德规范,塑造了一个有个性、有主见、敢食禁果的“美国夏娃”形象。埃德娜有一个看起来很幸福的家,孩子健康、聪明、可爱,丈夫勤奋、慷慨、宽容,为她提供了富足优越的生活条件,可结婚六

年后,埃德娜开始感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让她丧失了自我,她渴望摆脱对丈夫在经济上的依赖,渴望获得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机会,渴望找到心灵与肉体完美结合的爱情,于是她离开了舒适豪华的家,搬进了狭小但完全属于自己的“鸽子笼”,然而与她深深相爱的罗伯特无法摆脱旧婚姻制度的桎梏,和其他男人一样把女人看成丈夫的私有财产,认为她属于她的丈夫并因此永远离开了她,绝望的埃德娜只有义无反顾地游向大海深处^[9]。

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悲剧性结局

“新女性”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观念、婚姻制度、性别角色、行为准则,给美国社会带来不安与担忧,让许多男性和恪守妇道的女性感到惧怕,被称作“旧男性”(the Old Man)的男人发出如此质问:“你们要把我的妻子从摇篮和炉灶前拉到投票站吗?”他们担心:“如果去投票,她就无法料理自己该做的事”^{[4]11},就连女作家 Margaret Deland 都认为新女性不仅仅是一个笑话,不在家煲汤的女人是一种威胁^[10]。密歇根大学第一位女毕业生、美国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Amanda Sanford,虽然后来成为杰出的医生,但当时人们对大学女生持怀疑态度甚至不租房给她们,1871年在毕业典礼上男生冲她发出藐视的叫喊,向她扔脏手纸团儿^[11]。

阅读并亲历这样的历史语境,朱厄特、吉尔曼和肖班深知“新女性”在追求工作机会、经济独立、政治平等的斗争中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描写“新女性”勇敢追求的同时,她们更多地表达了女主人公进退两难的困境、徒劳无益的挣扎、无可奈何的放弃,她们的叙事不可避免地显得惨淡甚至悲壮。

在朱厄特看来,“传统文学作品关于女性本质的描写是错误的。事实上,女人,和男人一样,必须追随自己内心的向往,在生活中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不要顾忌性别”^[12],所以,在《汤姆的丈夫》中,她让妻子玛丽做生意、管理工厂而让

丈夫汤姆操持家务,完全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新女性”的职业追求。然而,在该作品发表十年后的19世纪90年代,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人数还不到二分之一^[13],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玛丽想永远驰骋职场几乎是异想天开,因此,在故事结尾,当事业蒸蒸日上的玛丽欣喜地称赞丈夫是好管家时,丈夫面带不悦,一改往日的优柔寡断,毫不犹豫地告诉玛丽“把未来至少六个月的事情安排好,我今年要在欧洲过冬”^{[7]213},在这个貌似性别角色成功转换的家庭,汤姆依然无法忍受妻子事业上的成功,依然要维护自己作为男性在家庭中主导者、决策者的地位,他少有的果决,让玛丽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追求是对传统的僭越、是大逆不道,于是,三周后他们坐上了去欧洲的船。

如果说朱厄特与她的“新女性”对新的性别角色与身份浅尝辄止,而吉尔曼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新女性”,她在现实生活中践行“新女性”标准,在其理论著作中研究“新女性”生存之路,在其小说中建构“新女性”形象。作为著名的早期女权主义理论家,吉尔曼通过写作与演讲揭露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宣扬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她创办了主要探讨女性问题的《先驱者》杂志并独立承担撰稿、编辑工作,她出版了《妇女与经济》、《家庭:它的作用与影响》、《人类活动》、《男人制造的世界》、《他的宗教和她的宗教》等著作,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论述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地位,分析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呼吁男女平等,号召女性参政,另外,她还通过小说宣扬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如《移山》表达了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共同参与社会生活的理想,《她乡》描写了一个和平有序、运转良好的女性乌托邦,而把吉尔曼女性主义主题表达得最淋漓尽致的作品应该是《黄色墙纸》。

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是一个希望通过写作来重新定义自己的知性女人,她患有产后抑郁症,她的丈夫强迫她住在一个窗户装有栏杆、曾经是育儿室的房间,为她制定了细致到每小时的作息时间表,禁止她思考和写作,所有的男人(丈夫、哥哥和著名医生)一致认为思考与创

作不适合她,会让她劳累,会加重她的病情,而作品中的其他女人(丈夫的妹妹和保姆)也根据男性医生的嘱托时时刻刻照顾她,她被视为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与儿童,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与其说她被关爱、被治疗,不如说被监管,主导她一切的男性剥夺了她独立思考的权力、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权力,这样的生活如同牢狱,而她却无法挣脱,疯癫便成了她不可避免的结局。据《美国妇女造像》,“新女性”形象的出现当时社会引起了激烈的美学辩论,“新女性”的“可婚性”受到质疑,长相端庄的女权主义者 Margaret Fuller 被认为是丑陋的,因为她经常公开发表自己的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见解,展示超越男性的智慧^[14]。当时的社会不能容忍女性的智慧,因此,吉尔曼无法让她的女主人公如愿成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获得满足、实现自我价值。

当朱厄特和吉尔曼的“新女性”为工作与创造的权利而抗争的时候,肖班把笔触伸向一个无人触及的禁区,她的“新女性”在争取经济独立的同时,还反抗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追求人性的独立与自由,希望获得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以及与男性一样享受性爱的自由。《觉醒》中埃德娜厌倦了男权社会分配给自己的相夫教子的角色,厌倦了死水一般毫无激情的家庭生活,于是她离家出走,去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希望用绘画表达自己、养活自己,也希望获得灵魂与肉体完美结合的爱情。然而,正如 Sara Grimke 所言,当时的美国社会把婚姻看成人幸福与存在的必要条件,期待女性成为“漂亮的玩具”和“消遣的工具”^[15],埃德娜对现存婚姻制度的挑战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人们不能接受她对男权社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藐视,在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无法实现的理想之间,没有她可以生存的自由空间,死亡成为她唯一的出路。

五、结 语

“新女性”文学诞生于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一个“真女性”与“新女性”共存的时代,一

方面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旧秩序的卫道士依旧为女性画地为牢,这些时代特色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新女性”文学中。虽然说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有很多事业成功、爱情幸福的“新女性”,但“新女性”文学作品特别关注的则是这些离经叛道的女人的生存困境与悲剧性结局。

《汤姆的丈夫》、《黄色墙纸》和《觉醒》中三位“新女性”自我解放的斗争以妥协、疯癫、死亡而告终,悲凉甚至惨烈,令人惋惜、令人哀叹。玛丽刚刚试探性地迈出“女性领地”便随即转身返回,

重拾夫唱妇随的角色;撕碎黄色墙纸的女人只能在疯癫后获得自由;埃德娜独立的精神与被唤醒的肉体不堪旧礼教的囚禁,只能在死亡中寻求解脱。

不完美、甚至悲剧性的结局常常是文学作品的美学追求,但在“新女性”文学中,它是历史的必然,彼时彼地,朱厄特只能让玛丽妥协,吉尔曼不得不让她的女作家疯狂,而肖班根本无力把游向大海深处的埃德娜拉回岸边。她们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或者说,历史没有给她们另外的选择。

参 考 文 献

- [1]DEGLER, CARL N. At Odds: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7.
- [2]LYSTRA, KAREN. Searching the Heart: Women, Men and Romantic Lov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7.
- [3]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24.
- [4]FULLER, MARGARET.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L]. Project Gutenberg, 2005-08-01. <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8642>.
- [5]SANICA Falls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 [N/OL]. Rutg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010-08-01. [2011-10-17]. <http://ecssba.rutgers.edu/docs/Seneca.html>.
- [6]Bordin, Ruth. Alice Freeman Palmer: The Evolution of a New Woman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3.
- [7]JEWETT, SARAH Ore. "Tom's Husband." [J]. Atlantic Monthly, 1882(49).
- [8]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Yellow Wall-Paper" [A]. In: Candace Ward. Great Short Stories by American Women [C].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96: 74-88.
- [9]CHOPIN, KATE. The Awakening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2003.
- [10]DELAND, MAGRGARET. "The Change in the Feminine Ideal" [J]. The Atlantic Monthly, 1910(3):289-302.
- [11]WOLFE, MARY ELLEN. "Who Was Dr. Amanda Sanford, And Why Have We Forgotten?" [N]. The Blade, 1972-03-15.
- [12]SHAPIRO, ANN R. Unlikely Heroines: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75.
- [13]金莉. 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十九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333.
- [14]BANTA, MARTHA. Imaging American Women: Ideal and Ideals in Cultural Hist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53.
- [15]GRIMKE, SARA. "Letters 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Condition of Women" [A]. In: Alice S. The Feminist Papers [C]. New York: Bantam, 1974: 306-318.